



红色盐池和《王贵与李香香》(下)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原秘书长李云桥老人与李季曾有过两面之缘。据他回忆说:1956年,诗人李季来到银川看望曾经在三边一起工作过的梁大均、姚以壮、刘山,时任中共银川地委书记的梁大均、秘书长姚以壮、宣传部长刘山非常高兴。李季对农村有深厚的感情,特意提出要去农村看看。而时任中共银川地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李云桥,作为向导陪同李季一行走访了北塔等处的农村。

李季是在心里爱农村、爱农民的。他说:脱离了农村,他什么也写不出来。在北塔村,李季看到这里有湖,湖里荡漾着芦苇,远处的贺兰山清晰可见,李季夸赞说:银川真可以说是人间天堂啊。游览了中山公园后,看到了石头上刻写的岳飞的《满江红》中“驾车、踏破贺兰山缺”后,得知“贺兰山”指的就是宁夏的贺兰山时,他说:宁夏的古迹很多,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宁夏应该好好写写。来到银川东门外的今满春乡(过去叫旧满城村)、孔雀乡(过去叫空湖村),看到了一片丰收的景象,到处欢声笑语,李季说:

旧满城村这个名字叫得不响亮,和丰收的场面不协调。当时,李云桥记在了心里。1958年,他担任了银川市委秘书长后,在重新编排各乡村名称时,便提议将旧满城村改为了现在的满春乡,空投湖村改为孔雀乡。

中午,在地委食堂由梁大均书记作陪,请李季吃了羊肉饺子,喝羊肉汤,吃烧山羊。梁书记与李季开玩笑说:“这回你又吃上宁夏的羊肉了。”李季说:“多年没吃了,真香啊。”这时,梁书记又说起了李季创作《王贵与李香香》过程中的艰苦,他说:“你在盐池写《王贵与李香香》时可吃了苦头了,晚上点一盏小油灯,天气又冷,脚下放一个砑子脸盆烤火,饿了吃两个山芋蛋,累了在院子里跑两圈,就这样写出来的。”

1980年,李云桥和徐宗望(当年他在三边工作,是李季的挚友)去北京开会的时候,来到了李季的家中看望他。李季请他们去了北京的东来顺吃了一顿香喷喷的羊肉泡馍,李季说:他一辈子都在想念宁夏的羊肉味。

既然诗人是在盐池县创作完

成了《王贵与李香香》,那么,主人公王贵与李香香的原型是盐池人吗?历史上有无其人呢?

李云桥老人回忆,当年李季来银川一同吃饭的时候,李季曾说过:“我写这个诗集就是你们盐池的父老乡亲给我的灵感,盐池就是我的根……”他说,《王贵与李香香》的人物原型来源于盐池县,同时结合了在三边其他地方搜集到的创作素材创作而成的。

而李季夫人李小为先生在《李季创作(王贵与李香香)前后》一文中提到了“香香”的来历,认为李季为女主人公起名源于盐池县政府一名通讯员的未婚妻的名字。男主人公叫王贵,可那个可爱而纯真的女孩叫什么?为了她的名字,他(李季)反复考虑,一张粗糙的纸头上,密密麻麻列了一百个农村女娃常用的名字,却不能使他满意。一天晚上,小通讯员又来找他问字了,那小鬼刚跨出他的房门,他就琢磨起来:这个小鬼头为什么今天问几个字,明天问几个字?他把那些字连接了起来,原来是一封给他乡

下对象写的书信,那女孩的名字叫香香。香香,多动听的名字呀!他的眸子闪烁着兴奋的光彩,长长松了一口气,急忙拿起钢笔,在那张小纸头上一百零一个名字下边加了“香香”二字,他边写边自言自语地说:“王贵的爱人就叫香香吧!”

链接

李季(1922年—1980年),河南省唐河县人。1938年到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在八路军中任连政治指导员。1942年冬从太行山转到陕北三边担任小学教师、县区行政干部和地方石印小报编辑,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一些通讯、小说和诗歌。其中1945年创作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在诗歌方面实践毛主席文艺路线的第一个成果。新中国成立后,李季又写了长篇叙事诗《杨高传》(分《五月端阳》《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玉门儿女出征记》三部)、《石油诗》等多种诗集。(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解放初期银川市的供给制(二)

医药费:按每人每月小米5斤供给,仅限无医务所地区。

保健费:按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妇女工作人员及在校女生人数供给。每人每月发麻纸(卫生纸)20张。产妇在产前产后休假2个月,按中灶标准供给。并在产前产后发红糖2斤、鸡2只、鸡蛋60个、麻纸100张、棉花4斤、棉布80方尺。

保育费:按在职妇女干部子女多少予以供给。有6岁以下一个孩子的,两家合雇一名保姆;有6岁以下的两个小孩的,一家雇一名保姆。保姆待遇同一般勤杂人员。

全市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学校等单位的公费开支,均执行供给制度。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供给标准,依单位工作人员实有名额、交通工具种类及数量等,分工杂费、马杂费、修车费、宣传印刷费、学生公杂费、特支费等类,统一予以实物供给。

公杂费:干部每人每月发麻

纸15张、麻油8两(灯油)、中等毛笔1支、小米4斤半;战士与勤杂人员每人每月发麻纸5张、麻油3两、小米2斤半,3个月发中等铅笔1支。以上包括灯油、理发、书报、邮费、办公用品、零星修理、购置及值班抄电稿等杂费在内。具体由各主管单位调剂、发放。

马杂费:运输骆驼,每峰每日料5斤、草12斤;驮骡,每头每日料5斤、草10斤;骑马,每匹每日料4斤、草12斤;牛,每头每日料4斤、草12斤;驴,每头每日料2斤半,草7斤。后又补充规定:驮骡及拉车骡马,山地每头(匹)每月以大灶1人30天伙食标准供给,平地以20天标准供给;骑马,山地以20天标准供给,平地以10天标准供给;骆驼,以15天标准供给(食盐在内);毛驴,山地以10天标准供给,平地以5天标准供给;拉车牛,以10天标准供给。

修车费:自行车每月每辆以

大灶伙食1人30天标准发给;大铁轮车每月每辆以1人40天标准发给。

宣传印刷费:市、区级机关,每月每人发一等麻纸10张,乡级不发;文艺团体、宣传队等,每月每人发麻纸30张。

学校公杂费:全供给制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每人每月发小米12斤;全供给制干部子女小学学生,每两人每月发中等毛笔1支、每人每月发麻油3两、小米3斤半、中等麻纸10张。教职员照一般干部标准发给;自费中学、师范学生,每人每月发小米6斤,自费小学生一律不发。

特支费:包括会议餐、招待、脚费、渡河、乘车、文化娱乐等费用。按规定,一般市每月发小米160斤。银川市因处于交通要道,每月发小米240斤。特支费由市委、市政府及其附属单位共有,由主管机关统一主持调整,财政部门核销。

1950年1月,省财政厅指示裁减机关骑马和运输牲畜以节省马杂费支出。缩编后,银川市政府只留公用牲畜1头,其余骑马和运输牲畜一律取消。市委和政府及公安局共用自行车8辆。同时将各单位公用大车全部收回,重新分配,充实了公安局、法院、税务局、警卫队的运输力量。

1950年4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新的供给标准。8月,省财政厅通知,以前旧有个人供给标准一律作废,并依据中央统一供给标准和中央西北局《供给标准在西北实施具体说明》的原则,编印《供给标准在宁夏实施具体说明》,对部分供给标准作了一些更改和补充,并从当年10月份起开始执行。这次更改的主要内容,是将原属个人供给的差旅费部分,划入公用开支部分供给,其余变动不大。

(未完待续)
(据银川党史网)

西征红军播下的火种(上)

——记彭阳县红河地下党支部

1936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中共中央于14日在延川县大相寺召开会议,总结了东征,部署了西征。5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了西征命令及西征战役计划,以红一方面军主力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率领1.7万余人,分左、中、右三路向陕甘宁边区地区进军。西征历时半年,进行重大战役10余次,解放了今宁夏东南部城镇10余座,开辟了纵横各200多千米的陕甘宁新根据地。

1936年底,在红军的影响下,今宁夏彭阳县红河乡的贫苦农民成立了红河乡抗日救国委员会。野王街是红河乡的一个小村镇。1937年3月,进驻在离野王街仅三里路的赵河庄的红军战士,经常到野王街向赶集的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红军的到来,让老百姓看到了一支不同于国民党“胡子兵”的军队,他们不随便进入老百姓家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公买公卖,红军的影响迅速在红河乡扩大。有了群众基础,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为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共固原县委决定将红河乡划为统战区,红河乡抗日救国委员会改称红河乡抗敌后援会,同时我党在野王街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保农会”,开展了组织、发动群众抗日救亡,秘密发展党员的工作。也

就在这年,受上级派遣,庆环分区党委干部李有福和固原县委党员朱孟才来到红河乡野王街。朱孟才经过多方观察和了解,认为野王街给地主当过长工的王兆璜老实、忠厚,是一位极爱爱国热情的纯朴农民,于是推荐王兆璜担任野王街抗敌后援会主任。从此王兆璜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不久,在李有福和朱孟才的教育和培养下,王兆璜成为红河乡的第一个中共党员。9月,贫苦农民王进堡又被秘密发展为共产党员。到1938年又有4个农民入了党,并组成了一个党支部,组织上任命王兆璜为支部书记。

中共红河支部成立伊始,便遇到了非常严峻的形势。红河乡地处陕甘宁边区的边沿地区,此地的国民党顽固派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他们经常对革命新区党、政组织进行破坏,威胁、迫害人民群众。1939年4月,敌王洼区公所区长王胜之让第六保保长雷玉朝取缔“保农会”,并造谣诽谤这些抗日组织。为争取“保农会”的合法存在,红河支部负责人王兆璜与陈麻子圈抗敌后援会主任李治安等,在上级党组织三岔党委的领导下与雷玉朝等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群众识破了反动派阻挠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阴谋,王胜之企图摧毁抗日组织的反动气焰被压了下去,红河党支部胜利地保卫了“保农会”。

1938年到1940年春,国民党固原县军政当局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许多共产党员与党失去了联系,区、乡抗敌后援会组织全部解散。由于王兆璜担任乡抗敌后援会主任,他的身份是公开的,所以敌人便时常扬言:“要割王兆璜的头!”“要取王兆璜的肝花!”敌人的恫吓并没有吓倒红河支部的同志,他们在极端危险、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开展革命工作。面对白色恐怖,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确保红河支部和王兆璜的安全,一方面将红河支部未暴露的党员隐蔽起来交中共平东工委领导,一方面调王兆璜和其他地方已暴露的10多名党员干部到边区环县去学习。在边区王兆璜看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通过边区领导的言传身教,使从边区进过学校大门、长工出身的王兆璜真正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贫苦农民的靠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他们唯一的出路。3个月学习结束后,组织上找王兆璜谈话,准备将他留在边区工作。但王兆璜舍不得个人安危,他真诚地向组织请求回到红河乡和战友们并肩战斗。在王兆璜的一再坚持下,党组织批准了他的请求。王兆璜衣襟里裹着一卷革命传单,匆匆离开边区,冒着生命危险,躲过敌人的盘查,回到了日思夜想的红河乡。从此,红河乡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39年,红河党支部又新发展了党员9

名。党员分布在野王街上峽峁、杨义沟、黄土湾等6个村庄;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由王进堡任支部书记。

红河支部是在白色恐怖最为深重的岁月里,坚持在白区斗争的少数几个党支部之一,他们成为在黑暗统治下人民群众的主要依靠力量。为了更好地开展隐蔽斗争,红河支部吸取相邻的甘肃镇原县平泉和虎泉小园子地下支部因泄密而被敌人破坏的教训,从加强组织纪律入手,对党员提出了“不准喝酒,不准通财,不准说假话,不准暴露党的机密”的严格要求,确保了敌后工作的顺利开展。

1940年,中共平东工委在固原地区设立了数个接待站,负责地下工作人员往来的食宿和安全,红河支部多次接待和护送组织上派遣到敌占区开展工作的同志。1942年夏天,上级党组织要求红河党支部护送两位从环县元城子到青海开展敌后工作的同志到平凉。为了确保到敌后开展工作的同志的安全,红河支部作了周密安排,他们将两位同志所带活动经费藏在馍馍里,由熟悉地形、经验丰富的王兆璜护送。两位同志在王兆璜的掩护下巧妙地躲过了敌人的层层哨卡,穿越人烟稀少的山区,打退了土匪的拦路抢劫,顺利地到达了平凉。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几个保长平时欺压百姓,帮助国民党抓兵要款,民愤极大。(未完待续)
(据宁夏档案微信公众号)

移民岁月

第七十九期

将核辐射应用到农业生产领域的开路人(二)

——记宁夏农林科学院核辐射研究应用专家归国华侨陈桂松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陈桂松:因为离开老家太久,一个亲人都找不到,怕回马来西亚不好给父亲交待,就不敢回去,其实也无法再回去了。

回大陆时大姐给了我们一些钱,她把很多金链子和金首饰装到暖水瓶里,让我们带回大陆用,当时金子不值钱,过一段时间卖一点,花完了再卖一点,刚回来的两三年间就这样到处游荡。

我们回来时不会讲普通话,只会讲英文和广东潮州话,很难与人交流。听说汕头有个华侨中学,我就报名上学了,主要是想学中文和普通话,学习难度很大。二哥留在了广东,开始在一所学校当老师,因为他有美工基础,后来到电影院画电影海报,文革后因病去世。

华侨学校很多人都是刚从国外回来。听不懂课又喜欢玩,就到处跑。先到南京,再到上海,最后到了北京,到北京出了事啦,刚下火车就有人问,“你们是从广东来的归国华侨吗?”我们说是,他们就叫我们上车,把我们接到了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登记时要看证件,看了证件才知道登记错了人。原来他们是准备接另外一批刚从国外回来的华侨代表团和他们的子弟,因为都不认识,也没有当场检查证件,看我们也是华侨子弟,就把我们接到了他们学校。

这场阴差阳错的接站改变了陈桂松的命运,这时候已经是1953年。搞明白事情的原委后,校方准备把他们送回火车站。在孩子们的反复央求下,校方最后同意他们全部留下来,与其他华侨孩子一起参加中文补习,结束了陈桂松回国后三年的游荡生活。

陈桂松:我回国后不管走到哪里,手里都离不开从马来西亚带来的那个暖水瓶,因为里边有我姐姐给我的金子,没钱时就卖掉些,最后手表也卖了、钢笔也卖了。北京华

侨学校还给广东打电话。在核实我们的身份后,要求我们写保证书,保证再不跑了才让我们在他们那里读书。我在马来西亚也上过中学,成绩很好,回国后慢慢地也能听懂中文了,就想再上学,去买了一本《升学指南》,准备考高中,我当时数学、物理、化学成绩都很好,文科不行,没想到的是第二年一考就考上了,录取我到南京,我给学校说,南京我去过了,想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于是被录取到了东北。

陈桂松被录取到了沈阳一中,录取的前提是再写一份保证书,保证不再乱跑。沈阳一中是当时沈阳最好的学校,学习风气很好,对提高陈桂松的成绩帮助很大。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全国人民爱国情绪高涨,陈桂松的头脑里也有了报效国家的理想和信念。但学校也有让他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爱玩的同学不多,踢足球、打篮球常常找不到伴。

凭着天资聪颖,高中三年被他轻易地拿下,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吉林农业大学,学的是土壤农业化学专业。大学生活丰富多彩,同学们刻苦学习的精神给他留下了十分难忘的印象。在吉林农业大学,陈桂松骨子里的特立独行还在。爱学习也爱玩,喜欢把书本上的知识扩展到生活实践中又不死记硬背,得到了老师和校方的认可。

陈桂松很难适应东北的寒冬,宿舍是平房,没有暖气,只有一个铁炉子取暖,有时炉子灭了,房间里很冷,这让他很不适应。遇事喜欢动脑筋和在同学中有号召力的潜质被校长发现,直接任命他当起了班长,做的很多事还得到了校方的赞许。当时男女同学之间很少讲话,一些礼貌的社交行为也成禁区,让他难以适应。

(简银生 整理)

我就相信,胸前的这枚党徽(四)

——记宁夏农垦老战士许青培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组



许青培的退休生活。

休了,但我一刻也不能脱离党的组织,就像一个人需要氧气一样,空气里没有了氧气,人也就没有了生命。

居委会每次召开党员大会,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身体不适,许青培都会雷打不动地参加。即便是在他生命的后期,他腿脚不便,就坐着轮椅,让爱人推着去参加居委会的党组织活动。离休30年来,许青培老人多次获得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证书。2016年许青培的家庭被湖畔嘉苑社区评为“最美家庭”,颁奖那天,他让儿女们都来参加颁奖大会,他说,这不仅是我小家的荣誉,而是我们这个大家的光荣。他用这种形式感染和影响着他的儿孙们。

许青培唯一的儿媳2012年参加汶川地震的救援工作,返回到银川的那天,他要求儿孙们全部到现场,拿着鲜花去迎接,表达了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亲人的情怀,也用这种庄严的形式来感染每一个家庭成员。

每当儿孙们在工作中取得了一点成绩,许青培就竖起大拇指,在家族中大加赞赏,在家庭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正能量的良好氛围。

有着65年党龄的许青培老人,他的周身散发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浩然正气,弥漫着这个时代正能量的气息。他的言行在影响着周围的人们,影响着他的家人,他们在相互影响着,他们在共同进步着。

许青培老人的孩子们说,什么是共产党员,开始我们都认为那是一种心中的信仰,是一种遥不可及的理想,从父亲走的那天开始,他们对共产党员有了一个更新的认识,那就是像父亲那样,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这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他的一言一行上,体现在每时每刻佩戴在他心中的熠熠生辉的党徽上,体现在临终前他向党组织最后一次的真实忠诚上。许青培老人是时代的楷模,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优秀代表。他的儿女们自豪地说,榜样就在我们身旁。

许青培老人对党的赤胆忠心,将被后人铭记。
(祖宁平 马晓虎 整理)